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马克思主义 与 21 世纪史学编纂

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编

段 愿 译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马克思主义 与 21 世纪史学编纂

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编
段 愿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史学编纂/(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编; 段愿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4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ISBN 978-7-300-26914-6

I. ①马… II. ①克… ②段…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A851.6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3859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史学编纂

[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编

段愿译

Makesi Zhuyi yu 21 Shiji Shixue Bianz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2.75 插页 3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6 00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中心主任、教授。《布伦纳之争：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85) 的第一作者，其他作者还有阿斯顿 (T. H. Aston) 和菲利普 (C. H. E. Philpin)。其主要成果还有《商人与革命：1550—1653 年商业变化、政治冲突和伦敦的海外贸易商人》(*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 - 1653*, 1993)、《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2)、《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从长期繁荣到长期衰退》(*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 - 2005*, 2006) 等。

[英]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曾长期在英国约克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York) 从事社会和政治理论教学，现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欧洲研究教授。最新成果有《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1999)、《平等》(*Equality*, 2000)、《反资本主义宣言》(*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2000)、《美国权力的新官僚》(*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2004)、《批判的资源》(*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2006)。目前他正在写一部关于帝国主义的



著作。

[意] 安德里亚·贾尔迪纳 (Andrea Giardina),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 (the Istituto italiano di scienze umane) 罗马史教授、意大利国家科学院 (th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成员。研究领域包括罗马世界的社会、政治和行政史, 以及现代史学史。最新成果包括: 与沃希 (A. Vauchez) 合著的《罗马, 神话思想: 中世纪至今》(*Rome, l'idée et le mythe: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2000)、《意大利罗马: 身世未竟的故事》(*L'Italia romana: Storie di un'identità incompiuta*, 2004)、《卡西奥多罗政治》(*Cassiodoro politico*, 2006)。他还是系列书“古罗马”(*Roma antica*, 2005) 的编辑之一, 并撰写了其中第 14 卷《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000) 的“罗马世界晚期的家庭”(“The Family in the Late Roman World”)这一章。

[英] 凯瑟琳·赫尔 (Catherine Hall),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现代英国社会文化史教授。她与列奥诺拉·大卫杜夫 (Leonore Davidoff) 合著了《家庭财富: 1780—1850 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 - 1850*, 1987, 2002)。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她长期致力于对民族、帝国和自我的研究, 并已发表大量理论成果, 主要有《教化臣民: 英国人想象中的宗主国和殖民地, 1830—1867》(*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 - 1867*, 2002), 以及近期与索尼娅·露丝 (Sonya Rose) 合编的《与帝国共处一室: 都市文化与帝国世界》(*At Home with the Empir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World*, 2006)。目前她正在研究麦考利 (Macaulay) 及其史学著作。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曾任伦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历史系名誉教授、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客座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 (the British Academy) 院士、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 以及过去与现在学会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主席。1750 年以后, 编写出版了大量有关社会史和通史的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极端的年代: 短暂的 20 世纪, 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 - 1991*, 1994)。

[英] 沃尔特·加里森·朗西曼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剑桥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和英国国家学术院双院士, 并在 2001—2005 年担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拥有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牛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和约克大学的荣誉学位, 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外籍名誉成员。主要成果有《相对剥夺和社会公平》(*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1966)、3 卷本《论社会理论》(*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1983—1997)、《社会性动物》(*The Social Animal*, 1998)。

[英] 加雷斯·斯特曼·琼斯 (Gareth Stedman Jones), 剑桥大学历史系政治学教授。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研究员, 同时是这里的历史和经济中心主任。他的著作包括《被遗弃的伦敦》(*Outcast London*, 1971)、《阶级的语言》(*Languages of Class*, 1983)、《贫穷结束了吗?》(*An End to Poverty?*, 2004), 他还为企鹅集团 (Penguin)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2002) 作序。

[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1977—2005 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任教。目前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的“齐契利教授” (Chichele Professor)^①、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世纪意大利的社会历史, 以及后期罗马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社会与经济史比较研究。主要成果包括《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Early Medieval Italy*, 1981)、《山脉和城市》(*The Mountains and the City*, 1988)、《土地和权力》(*Land and Power*, 1994)、《12 世纪托斯卡纳的法院与冲突》(*Courts and Conflict in Twelfth-century Tuscany*, 2002)、《构建中世纪早期》(*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2005)。

① 牛津大学为纪念亨利·齐契利而设的教授头衔。——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余同。

目 录

表格目录	1
作者简介	1
一、绪 论	
[英] 沃尔特·加里森·朗西曼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1
二、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编纂：以罗马史为视角	
[意] 安德里亚·贾尔迪纳 (Andrea Giardina)	15
三、封建社会的记忆：马克思主义对中世纪史研究的影响及其 长远意义	
[英] 克里斯·威克姆 (Chris Wickham)	34
四、社会财产关系与社会发展：论亚当·斯密理论的缺陷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52
五、马克思主义及其延伸	
[英] 凯瑟琳·赫尔 (Catherine Hall)	108



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史学理论还是一种 共产主义理论？	
[英] 加雷斯·斯特曼·琼斯 (Gareth Stedman Jones)	138
七、革命的兴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 20 世纪	
[英]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158
八、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182
译后记	190

表格目录

表 4-1	资本主义（精简版）	62
表 4-2	封建主义	78
表 4-3	欧洲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500—1800 年	98
表 4-4	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1750 年和 1850 年	98
表 4-5	行业人口分布：1500 年和 1750 年	99
表 4-6	欧洲实际工资：建筑工人	99
表 4-7	欧洲城市化：1500—1750 年行业人口的相对增加	100
表 4-8	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城市化：人口总数达 10 000 以上的 城镇百分比	100

一、绪 论

[英] 沃尔特·加里森·朗西曼
(Walter Garrison Runciman)

英国国家学术院于 2004 年 11 月举办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编 1
纂：依然生生不息，或是声迹消沉，还是濒临消亡？”（“Marxist Historiography: Alive, Dead, or Moribund?”）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本书除绪论以外，其余各章均是此次研讨会上的论文。有些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时候被淘汰了，不仅因为像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所指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本书第 166 页^①），即众所周知的苏联解体，而且因为像克里斯·威克姆所说的，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萦绕在古代、中世纪、现当代史学家之间的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逐渐消停”（本书第 32 页）。要说这其中的一项最主要的原因（依我看）还在于，各种历史目的论在经历了长期衰退后最终消亡。显然，尽管现如今本书的读者都知道史学（或者说社会科学）比生物学更加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预测学，但马克思和斯宾塞（Spencer）的追随者们一直坚信，只要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理解和判断，就能预测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但是到了 20 世纪末，大家才普遍承认这种情况，即后续虽出现

① 绪论部分正文中括号标注的“本书第××页”，指原版英文书的页码，即此次中文版的边码。



了不少论断但却没有大师级的论断，虽有不少理论但却缺乏宏伟的理论，虽有不少观点但却鲜有发人深省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再也没有人对人类的命运做出权威的预言。

对那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宏伟的理论，又是大师级的论断，他们将马克思个人观点所得出的预言愿景视为至高无上的范本，他们之所以仍然感兴趣，是因为马克思预测的发展轨迹与后来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出入。然而，波普尔派（Popperian）和达尔文派（Darwinian）认为，一旦人们承认通过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形态的研究不能推导出人类社会的未来进程，马克思便不再被视为一位预言家，而被视为一位研究社会内部与社会之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史学家，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一个个不同的时代。对历史发展阶段线性评估范本的质疑，并没有削弱另一种改良的发展构想的价值，这种构想把人类社会视为非目的论发展进程下的产物，因为在历史的演进中总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使之变得不可预期，而这一产物也不是在事后胡乱炮制的。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言，利用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来洞察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从而不断树立对马克思的信任，仍然是可行的。

马克思之所以被认为已经丧失他在史学编纂方面一度拥有的学术地位，除了他对历史预言的失败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向批判界开放并作为理论前提的三个方面的理由，本书的多位作者对此做了直接论述。

理由之一，就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本书第 184 页）宣扬的“反普遍主义”（anti-universalism）——史学工作者除了记录个人的立场、观点、兴趣和价值观以外，不会再记录更多的历史。以马克思为例，正如加雷斯·斯特曼·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对历史的工具性兴趣就在于，历史是“发现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本书第 148 页）的工具，马克思和马克思的言行所表达出的具有广泛效力的所有论断，好像都源自他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最初认识，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而所有史学工作者都朝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带有主观目的所选择的研究领域靠拢。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已有的证据对过去给出合理解释从而获得普遍认同的历史，另一种是只对那些与个别史学家具有相同兴趣和价值观的读者产生共鸣的历史（单一因果论），

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没有斯大林的苏联的历史会如何，不同的历史学家仍将给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历史可以重来，那么对可能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物加以反事实推断就没这么容易了。然而，如卡利尼科斯所言，如果那些“偏向于由托洛茨基（Trotsky）发展的一种更极端‘客观’的革命进程模型”（本书第161页）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无论由什么个人经验或者态度来领导，他们都会是正确的。并非让大家认可威克姆所说的，即“用一把令人不安甚至是致命的利刃把历史划出一道口子之后，它才会进步”（本书第36页），因为就引导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而言，道德上的愤怒有时和公正的好奇心一样有效，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比其他人得出的结论更站得住脚。如果马克思把对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eon）的轻蔑更多地用在清楚地探究这个江湖骗子是如何达到权力顶峰的，那么他的结论又会是什么，法国的史学编纂是否会因此而发展得更好。 3

理由之二，就是马克思忽视了对文化的表达。这也是我们经常问到的：为什么他只关注欧洲白人男性工人的情况，而很少关注女性以及殖民地人们的情况？但是在当代的文献中，这个问题似乎被掩盖了。历史学家在对不同群体和种族的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筛选后，再对特定时代的事件和环境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就会把呈现事物的重要发展过程与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和结果割裂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描述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补充性言外行为，它有其自己独特的真实性标准、表征性标准和共情标准。在资本家的剥削下牺牲的工人阶级代表是马克思所选的研究对象，但他忽略了与之拥有同样遭遇和诉求的其他人群，而这让他失去了对资本主义道德控诉加强言外之力的机会，不过关于这一点尚存争议。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想的那样，假如任何个人的经历在不经意且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受到了影响，那么即便这是少数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能被视为历史阐释的逻辑本质。这一论断是基于他对生产方式如何成功地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所做出的解释，这种成功不会因为加入了对变革时期人们所思所感的额外表达而增强或减弱，而这些人正是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笔下由于其他原因应当被从“后世的不屑一顾”^{[1]①}中解救出来的人。

① 中译文出自：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5。

理由之三，就是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本书第 167 页），那些资本主义捍卫者在他们自己设的局中击败了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似乎押错了赌注：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同一时期发生直接对抗时，资本主义会是更强的一方，他拒绝接受这种可能。他又一次违背了史学观点。如果马克思被视为一位社会学家而非预言家的话，那么比起他自己批判性的假设来说（假如他和我们一样，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时至 21 世纪资本主义仍然旺盛的原因他或许就不会那么惊讶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苏联解体等同于“历史终结”的等式，在构造上过于简单，在必胜论上过于幼稚，以至于很难对试图将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事件置于长期全球语境下的历史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很大的影响。诚然，在美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同在苏联一样渺茫，尽管苏联的工人领袖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但这样的经济供给犹有竟时。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本书第 181 页），资本主义之所以幸存下来且不断壮大，就在于它利用海外扩张伸入了一个正在激增的全球化市场，此外，马克思也已经想到，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可以通过投票箱得以实现，这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重视工人阶级的立场，致使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颠覆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推断，当美、俄两国将世界一分为二时，社会主义会衰败，资本主义会胜利。在此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威克姆和罗伯特·布伦纳在自己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么其理由在此并无意义。

一
一

以社会学家马克思代替预言家马克思，对研究马克思对新闻出版领域的影响，尤其是研究他对法国史学编纂等方面的影响，会有所帮助。肯定有大量当代读者已经准备好对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说的话表示赞同：“马克思的这些著作是令人振奋的。也许在我们能够想到的历史空间里，在思想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读者在感受到一种新的智

力发现时能如此兴奋。”^[2]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凯瑟琳·赫尔要援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句“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②，来支持马克思给出的“阶级和殖民主义的中心问题”⁵（本书第118页），或者说卡利尼科斯应该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第一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编纂方法……就是通过叙事的结构来解决历史问题的”（本书第159页）。只要有记者大量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形，马克思（还有恩格斯）就会运用自己在任何方面都一贯的洞察力来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克思被证明的总是正确的可能性却并没有因为他积极投身革命的政治事务并进行必要的战略位置转移而有所增加。不过说马克思最有力的猜测不足以证明其史学理论的正确性的人，也不见得就能证明其史学理论的错误性。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刻画的模式是否属实，法国的历史是最好的检验。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斯特曼·琼斯所列的那样，马克思在运用社会决定论的方法“研究（法国）共和主义或在研究当选总统与当选议会之间斗争的本质特征时”（本书第147页）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且在于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已经站不住脚。不同于普鲁士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是完全“新”社会对抗完全“旧”社会的典型代表。对资产阶级的这种处理手法，就跟把大革命中的贵族阶级做了扭曲一样，显得太过简单。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广泛认同一种正统观念，用饶勒斯（Jaurès）的话说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时机已经成熟”^[3]，但是之后的大量研究却表明，资产阶级很少具有资本主义特性，而更多地体现了异质性，更紧密地融入了参与法国经济部分现代化的贵族阶级，而不是在一系列源于贵族革命（*révolte nobiliaire*）反抗君主制的不可能事件中，与归于自觉性和决定性的部分进行调和。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法国大革命都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4]然而，当今没有一位史学家会保留某种类似于现代资产阶级推 ⁶

① 中译文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

② 同①566。



翻旧封建贵族信念的观点，这种信念只有在马蒂兹（Matthiez）、列斐伏尔（Lefebvre）、拿布洛斯（Labrousse）的著作中才能看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颠覆“古代”政权（régime）引发的革命，经济上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成为三等公民群体参与起义的原因，其中包括农民阶级和巴黎人民，他们都对大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支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想要的那种预先确定的两大阶级相互斗争的结果。

我的结论并不是说《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没有阅读价值，也不是说马克思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在法国所发生的那些本就无法预测的变革。而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越努力想把马克思没有预想到的变化填补到他当时所处地位和时代背景下完成的设计蓝图里，就越难达到目的。对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未来，信仰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诊断的马克思的追随者而言，“什么错了？”是绕不开的问题。英、法两国已经够令人失望的了。但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如何领导苏联共产主义的？德国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为什么没能阻止魏玛共和国沦为纳粹政府？墨西哥革命怎么会最终形成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独裁宪政体制？如此等等。但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解释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悲叹那些没有发生的。关于这些可能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引发的思考和争论，是对多少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拷问。尽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通常是以翔实的学术知识呈现的，但对那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消遣，并无多大帮助，他们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变革是进步的，即未来总是不同于并受制于过去。这并不意味着除了所处时代下偶然影响个体的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环境随机相互作用以外，他们就不能达到更深的层次。相反，事后成为可能的解释必然依赖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过程，使一些结论成立的可能性比别的结论大。但是，在历史发生之前，没有人能说出它为什么正好如此发生以及为什么如此发生。

三

7 那么，在 20 世纪末，是否有历史学家对历史巨变的解释是从马克